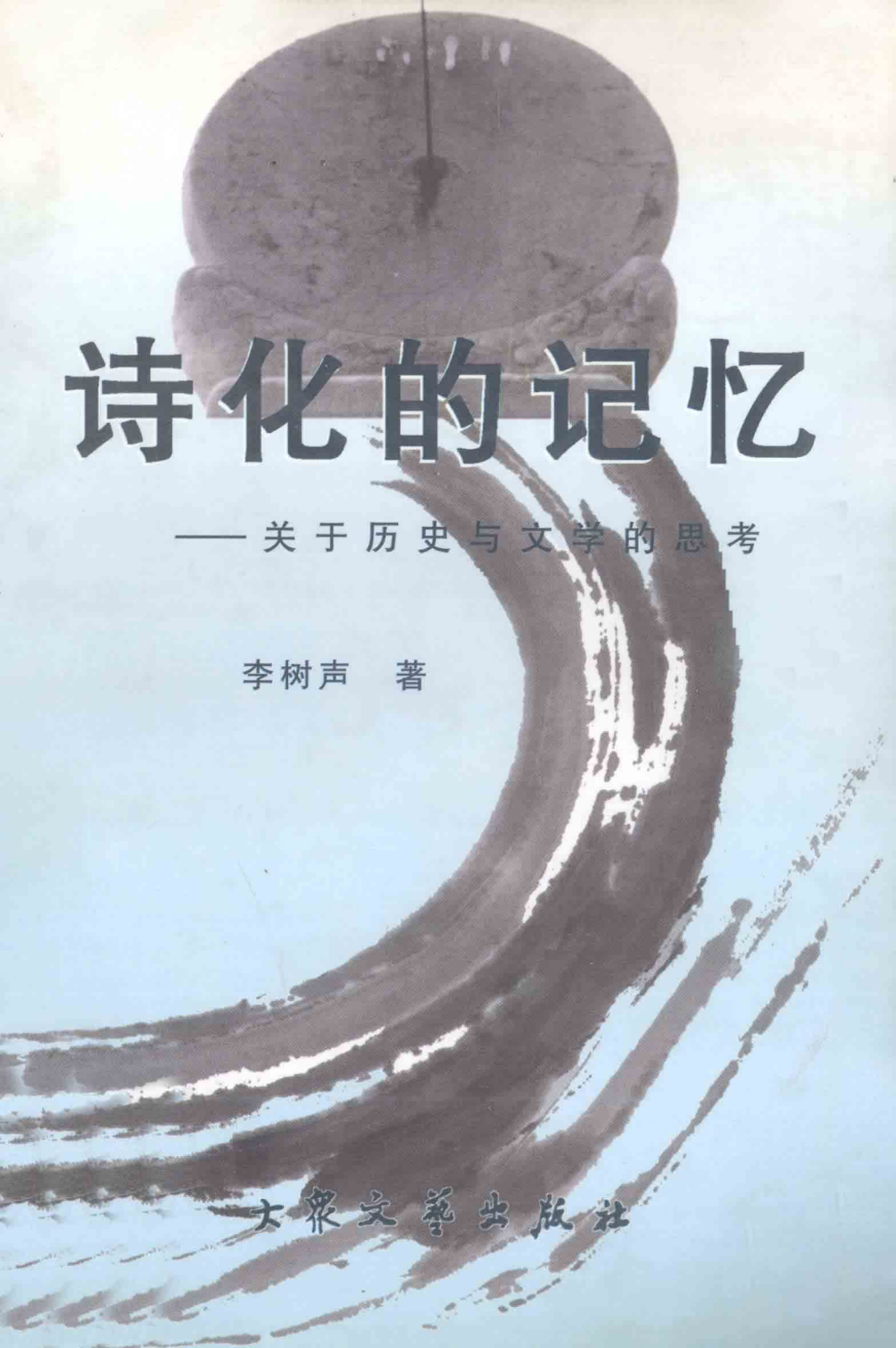




诗化的记忆

——关于历史与文学的思考

李树声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诗化的记忆

李树声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化的记忆/李树声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1999.4

ISBN 7-80094-429-8

I . 诗…

II . 李…

III . 文学理论-文集

IV . I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9)第 07483 号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邮编:100021

山东省高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5 字数 266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3.00 元

诗化品格的艺术开掘

——序《诗化的记忆》

张同吾

随着文学作品题材的不断扩展、精神天地的不断开拓、情感内蕴的日渐丰富和表现手法的百态纷呈，文学评论早已突破了社会学的框架和赏析型的模式，往往能够从哲学、美学、创作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边缘学科的视角阐释作品，为我们从不同的认知层面审视文学的内涵拓宽了疆域。但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过程，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认识人的文化现象、历史现象和生命现象的奥秘，也是不可穷尽不会完结的，任何作家都不应以先知自诩并以布道者的方式向人们解释一切，倘若他们能够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回眸历史窥探人生谛听生命的真谛，使其“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同样，文学评论家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圣者，而能注解一切阐释一切，倘若他们能够以独特的眼光发现作品独特的审美个性和精神蕴涵，沿着艺术规律的通道，走向作家心灵的深处，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对于作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揭示生活的深度和表现生活的角度；是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审美个性，方能使其超拔平庸而呈现光彩；对于评论家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对艺术规律的真知卓见，是在新的认识层面上以新的话语方式对作品进行理论解析，方能摆脱平泛而展示自己的评论个性。

李树声是在新时期阳光抚育下脱颖而出的文学评论家，以崭新的理论锐气，表现她的富有个性的评论风格，她即将付梓出版的《诗化的记忆》，集中地展示了她的理论锐气和评论个性。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题材的作品情有独钟，也许是因为她对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有更深入的思考，在她的这部评论集锦中，比较有深度和力度的是对长篇小说《星星草》、《少年天子》、《倾城倾国》、《暮鼓晨钟》、《孔子》、《曾国藩》、《李后主》、《百年沉冤》、《美之罪》、《真男子》以及电视剧《努尔哈赤》的纵横比较和精到剖析。这些作品中诸多历史人物，沿着各自的文化源流走来，带着深刻的历史烙印走来，带着鲜明的禀赋与个性走来，展示了丰满的血肉和独具神采的灵魂。树声以理性的目光去寻觅和审视作家们是否懂得“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性的存在”；是否懂得“与历史学或历史教科书相比较，历史文学是昔日的人存在的艺术化与审美化，与当代题材相比较，它是以‘彼时’、‘以往’、‘过去’的时间方式来展示人的审美和意义的。所以历史文学无论是作为一种文学样式或是表现历史的一种方式，其目的都是以人为对象主体。”因此，作家们不该满足于真实地谛听历史的回声，不该满足于以生花妙笔再现千年恩怨百代歌哭，而应该“把自己深深地沉浸在对象主体的情感世界中，在心与心情与梦的化合中来提纯历史生活，从而呈现出一种超凡的人性魅力和诗化的人生哲学。”这种人性魅力和诗化哲学，绝非是让作家的主观色彩遮掩了历史真实，扭曲了人物的性格逻辑，而是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一方面人是“具有自然力、生命

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同时又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人就是在追求中开创历史，“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产生一样，人也有自己的产生活活动即历史，但历史在人的意识中反映出来的，因而之作为产生活活动是一种意识地扬弃自身的产生活活动。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倘若能够从这个认识基点出发，就能够“通过个性主体这个社会因子的剖析和开掘，来展示宏观世界的底蕴，以一种凝重苍凉的笔触，对人物特殊的心理机制做深层次的把握，在对象主体心灵的聚集点上，使作品获得意识的深化和艺术的灵性”。在这一点，标明优秀作家们认识的升华，也表明了树声同他们的理性共识。

树声是位富有历史感的评论家。从严格意义上说，历史是一种记忆的参照和在记忆参照中建立起的价值体系，那么历史感就是人对历史的深层情感反映，其主要对象就是在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主体——人、人民、民族和人类。即使是评论当代生活题材的作品，也表现出这种鲜明的历史感，《对刑天救赎的失落》便是其中有代表性的论文。她有感于一些描写“知青”的作品意向的偏颇和思想内涵的轻浅，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传统思维定势——回恋过去，从而用情感粉饰那个时代的本质。她具体指陈一代人的命运悲剧，是造神运动的派生物，“对人的个性、价值以及生命意义是一种全面的扼杀，属于个体生命的自我意识被抽取殆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整体划一的虔诚和盲从，最终，这支队伍的群体意愿也被现实嘲弄了。”她在文化流变中，凝视人们

心理结构的生成与递嬗,便增强了理性的质量感。

文学评论忌讳脱离作品的云山雾罩天马行空,也厌弃拘泥作品的细琐繁冗,而应该在对作品得失的阐释中,融解了文学、史学、哲学、美学的理论精髓,并且形成评论家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评论风格。树声的评论文章视野开阔、见解明朗、舒展大器,她的长长的句势充溢着激情,在铺陈与描绘中起伏迭宕,许多精采的段落,都像雄浑的诗,这似乎同她襟怀坦荡的气质和奔放磊落的性格相统一的。当然,她所涉猎的作家和作品还不够宽广,有时也失之表述上的有序与规范,但我相信,她以自己的悟性和勤勉,会不断丰厚更加深湛更有风采。

1999年1月30日

目 录

序	(1)
---------	-----

走近祖辈文化

天地有正气

——《暮鼓晨钟》放谈	(1)
------------------	-----

《真男子》：参悟“士”心态	(12)
---------------------	------

古今的化合与凝聚

——谈近年来的历史小说	(19)
-------------------	------

对往昔做诗意的诠释	(39)
-----------------	------

回溯远古的文明	(47)
---------------	------

超出史范的新作	(53)
---------------	------

历史的启示

——短篇历史小说探微	(60)
------------------	------

高处亦胜寒

——漫评《少年天子》	(68)
------------------	------

叩问人类的昨天	(75)
---------------	------

抖落时间的绳索	(88)
---------------	------

气势磅礴的《努尔哈赤》	(110)
-------------------	-------

诗化的记忆

——从凌力的创作说开去	(114)
-------------------	-------

走近祖辈文化	(128)
--------------	-------

几度哀歌向天问	
——评《曾国藩》·····	(133)

岁月不蚀的记忆

《父亲》：一个时代的“背影”·····	(149)
捡拾飘零的树叶与兽皮·····	(155)
长歌当哭	
——谈迟子建的处女作·····	(164)
在有轰动效应的时代	
——八十年代中短篇小说争鸣纵览·····	(177)
岁月不蚀的记忆	
——巴波创作谈·····	(233)
在生活的河流中求索·····	(246)
读几篇写心路历程的作品·····	(257)
“乡下人”的命运交响诗	
——漫评陶正的作品·····	(269)
从荒漠走向绿洲的步履	
——近年来文学评论中提出的几个理论问题·····	(281)
对刑天救赎的失落	
——从一部写知青命运的小说谈起·····	(305)

感受大时代

《第二草国》的启示·····	(319)
----------------	-------

对文化的传承与思考	
——评《人生镜语》·····	(330)
把灵魂裸露出来	
——《京华闻见录》随感·····	(335)
长路漫漫会有期·····	(339)
赤子之诚与死亡之谷·····	(343)
雅可耐与俗不可耐·····	(350)
牵住命运的衣角	
——读几篇青少年题材的报告文学·····	(360)
感受大时代·····	(365)

解读人生况味

把美与爱带给世界·····	(375)
奏响民族最强音·····	(379)
谁人擎此重如山·····	(382)
启功先生的学问·····	(386)
守住平常心·····	(391)
寻找“愆”·····	(393)
《人生》：解读人生况味·····	(395)
访寻小小的安琪尔·····	(404)
深思共同走过的从前	
——从一部电视剧中的形象塑造谈起·····	(409)

天地有正气

——《暮鼓晨钟》放谈

这是怎样一个风诡云谲的历史氛围，天事、地事、人事炙烤着这位冲龄皇帝的心，从而展示了康熙作为政治上的胜利者日趋冰冷的悲剧灵魂。这是怎样一个沧海横流的大时代，中华大帝国最后一个辉煌时期的晨钟与封建社会将日薄西山的暮鼓齐鸣。这就是继《少年天子》、《倾国倾城》之后，凌力在她的新作《暮鼓晨钟》中，为人们展示的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有一位文艺理论家在概说中国小说发展程序时说，当代小说总体上是“由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到“人物性格的展示阶段”。纵观凌力从《星星草》直到如今的《暮鼓晨钟》等作品，我们看到，她正是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走过这样几个阶段。在以往的文字中，笔者曾经谈到，这位很有创作灵性的女作家，在历史文学创作这一领域曾较早地领悟到

“把人作为创作的中心”。如果说那部曾蜚声文坛的《星星草》是处在把生活故事化的展示阶段的话,那么,她从《少年天子》就已经步入人物性格的展示或人物内心审美化的展示阶段了。例如《少年天子》中对福临与乌云珠那诗情画意般情感的描画,《倾城倾国》中对孙元化心灵轨迹的追寻,都显示出她已经进入了创作的较高境界。《暮鼓晨钟》则在原来创作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新的超拔。也许是中心人物既定的特质所致,这部写康熙这位少年天子甚至是幼年天子的作品,要比写顺治的《少年天子》创作主体意识增强了,进而使作品本身更具理性化和历史穿透力。

凌力从不以一位有相当创作成就的作家自居,她淡泊名位。但在历史文学面前,她绝不在自我封闭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创作的思考,而是从各方面感受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艺术理论和创作形式的八面来风。在以自己的创作同外界对话的过程中,不断摄取新的信息并调整自己的创作意识。这使她在观照自己笔下的历史人物或事件时,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一种整体意识。某种程度上,她是把彼时彼地的本民族的思想观念、风俗、信仰,放到世界格局中去考察,把那一段清史作为世界史中的一部分。在与别样的文化体系的比照下,用一种既是陌生化的非我的,又是相当熟知的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的目光,互为主观,从而试图完成某种民族意识的自省。确立这种整体意识——世界意识,用鲁迅的话来讲,即把本民族的文化发展放在“参与世界上的事业”这样的—个参照系来思考。这一点在凌力的《少年天子》、《倾城倾国》中已初见端倪,如《少年天子》中

庄太后、福临与德国传教士汤若望的密切交往，顺治对自身的思考，对人、宗教、天地万象的叩问，以及他那种以推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自况的历史沉重感。《倾城倾国》中孙元化一家对天主教的笃诚，这种展示在当代历史题材作品中是少见的，可它却给读者创造了一个新的、不同文化交汇的氛围。《暮鼓晨钟》在原有的基础上，使作者的文化整体意识从朦胧走向自觉，作品把康熙四年的“天算案”作为全书的一条主线，把年仅十岁的小皇帝置于满、汉、洋三种文化尖锐对峙的矛盾的聚焦点上，从而展示康熙皇帝少年有为、雄才大略的君王素质。

“天者，百神之君也”，这一点在清王朝满汉民族中早已取得了共识。开明的顺治皇帝却把钦天监如此神圣的职责任任给以德国神父汤若望为首等几位“洋人”。先进的科学知识，天主教徒的忠诚和敬业精神，使得这几位“洋人”对于坐定北京的满清统治集团给予了很好的辅助。《暮鼓晨钟》开篇就为我们勾绘了这样一个场面：当四大辅臣与议政大臣、清王贝勒为圈地问题争论不休时，孝庄太皇太后传旨，她根据钦天监奏报：“慧星见”、“白光黯然”，于是降旨“此乃天垂象示警，应力图修省”。故而，圈地一事便被搁置起来，众辅臣敢怒不敢言。当然，由此也使矛盾激化，辅臣发难，一场天算案震动朝野。

作者精心地选择了天算案这一事件，这使她在“少年康熙除了尽人所知的擒鳌拜的故事以外，再找不出什么精彩内容”的创作窘境中超拔出来。柳暗花明，她在这里为自己创造了纵横驰骋的长天阔地。看起来天算案涉及的是天

事,实则是地事和人事,她把这天事、地事、人事交织融汇在一起,让小小的康熙费几番周折地去剥剔梳理,去分析裁夺。

围绕着天算案所塑造的一批生气贯注的人物,具体体现了作者的整体意识。如她所述:“作者写他的人物,不仅要冷静,而且要有博大的胸怀,同等地对待他们的真善美和他的假恶丑。”四位辅政大臣是天算案的主要人物,是朝廷中一股顽强的复旧势力。然而,在写索尼和鳌拜这两个人物时,作者描画出两个丰富的心灵世界。作为首辅的索尼显然是恪守祖制,主张圈地,对西洋历法嗤之以鼻的人物,但由于他忠诚仁厚,端方守节,所以对朝中一系列事物的处理上,则表现出一种客观务实的态度,例如他提出要处死汤若望必须有事实为证,特别是后来他主张皇帝亲政,顺应了当时的天时和人心,给孝庄太皇太后一个有力的支持。作品对鳌拜的描写更富神采。在其他作品中,鳌拜这个人物是企图篡位柄国凶神恶煞的恶魔。然而,在《暮鼓晨钟》中,鳌拜首先是一位刚勇豪壮的“巴图鲁”。他义救幼主博得康熙的敬爱,读者也不能不对他投去钦佩的一瞥。他以凛凛的刀剑、赳赳的烈马向康熙显示他的尚武精神。他主张弓马定天下,武功治天下,虽然十分偏激,但不能不说这显示出当时我满民族雄心勃勃的阳刚之美,也不能不说对他当时的“小友”康熙皇帝后来的文治武功、宽猛相济的一系列治国方略起过积极的影响。也许某种程度上,清后期的统治者们恰恰丢弃了这些东西。同时,作者也表现了鳌拜的这种尚武精神没有任何文明的思索,而是带有奴隶制胎记

的愚昧、本能、粗野的复合体。另一方面，作者深厚的爱心，也使这个人物富有很强的人情味。例如，他的五夫人玛尔赛对他的真正的爱慕和赞佩，唤醒了他在男女性爱上人性的自觉。对聪敏好勇的小皇帝的感情和忠于爱新觉罗氏的思维定势，使他一时手软失去了继续柄国的机会最终沦为阶下囚。作品对对象主体恰如其分的历史评价和道德评价使人们感到，鳌拜多行不义之后的结局是具有合理性的历史安排，同时亦感到即便如此，在清开国、坐定皇城之中他曾有过不可抹煞的功勋。可以说，对鳌拜的赞美是合理的，他的结局也是合理的，两种合理性形成了历史的必然性。

在描写天算案时，作者的笔触伸向我们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一方面她写道：“一向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京师平民，快乐得发疯，终年平淡无味，终年受人欺负，这下可遇到强猛的刺激，可有机会欺负别人了……”于是，唾沫、石子、臭鸡蛋一齐投向洋教士。此时此刻，他们有多少是非感和自尊心，有多少正义性和怜悯心，有多少人本身应有的自我意识？愚昧的心灵怎能了解自身的处境，无智的心灯怎能感应科学启蒙的微光！另一方面作者通过汤若望的口充满深情地赞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足以同欧洲古老的罗马帝国相媲美。它的文化之博大精深，它的伦理道德之完整牢固是难以想象的。”他对他的教友南怀仁说，你看到的“偏偏又不是这个民族的代表和精华”。如果作品仅仅通过京师平民表现这种民族劣根性或仅仅对民族传统文化赞扬备至，都是偏颇的，都不符合历史本身矛盾运动的规律。在此之中，作品对汤若望这个形象的塑造

确实又一次体现出一种大文化世界性的目光和博大的胸怀。以往笔者谈到过，人们往往容易把欧洲传教士与八国联军联系起来。而凌力自《少年天子》始，汤若望就是天主教徒的代表人物，当时西方文明的化身。《暮鼓晨钟》则把他作为天算案的中心人物来写。他出身德国古老的贵族家庭，自愿放弃继承权而献身天主，他客观地看待和理解一切人，对世界充满爱心。他从容赴死，有一种为信仰献身的精神。他不仅是苦心的传教士、热心的辅政者，也是一位深沉的思想家。作品描写了他从天算案想到当时的中国人不能容忍“地圆说”，想到天主教不能容忍“日心说”和“宇宙无限论”，由自己身陷囹圄想到被火刑烧死的布鲁诺……至此，作品才完成了对汤若望这个形象的全部塑造过程。对于当时的一位西方传教士能够认同到这样的程度，确实需要一种全人类的人性的意识和艺术家的勇气。显然，汤若望在天算案之中的思考是超前的，而这种思考只有放在他身上才是恰切的。正是作品这一系列超拔性的思考，才使人们更客观地看到，无论是西方文化或中华文化都有其精华和糟粕，任何一种文明都有它自身的局限性。否则，汤若望不至于被万人指斥，布鲁诺更不该处以火刑。

由于作者对写人的颖悟，《少年天子》为人们展现了极美的情爱和极豪壮的刚勇，而《暮鼓晨钟》则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几多的沧桑感、人生感，特别是理性意识。如果说《少年天子》是一位情窦初开的少女，那么，《暮鼓晨钟》则是一位秀外慧中的成熟女士了。这不是那一时代的成熟，人物的成熟，而是创作主体本身的成熟。这种成熟不只是文

学艺术本身的滋养或仅是对写人问题认识的深化，而是来自文学之外——对历史、社会哲理性的思考。这种思考大大地拓宽了作者的精神视野和思维空间，提高了作品本身的品位。使人感到小说不只是艺术家的创作，也是思想者的成果，从而显示出作者的诗识、史识和今识。历史文学的创作不应只停留在说故事、谈古今的水准上，它需要“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的理性意识的智慧之光的君临和启迪。在《暮鼓晨钟》所描写的清统治集团内部几番争斗中，在具体人物形象塑造上都显示出这一点。作品围绕着天算案、圈地、亲政中守旧与革新、腐败与反腐败的争斗写得生动、洒脱、妙趣横生，大有纵横笔间换星斗的气势，似有《三国演义》中群雄斗智斗法的意味。作者的笔下流泻着冷峻的思索，也倾诉着对历史的耿耿净言，描画出历史的形貌，又揭示了在那后面隐秘的线索。使人感到生活的戏剧之后，升腾着人与历史的较量，以及作品中反复显示的“天道”的自然和必然的指向。

在《暮鼓晨钟》中，塑造了一批“士”的形象。如吕之悦、龚鼎孳、熊赐复、王登联、苏纳海，也包括陆健、乔柏年、班布尔善和杨光先。作者高视点广角度地观照了这一形象系列。这群体形象中有在朝为官的，有在野隐居的，有慷慨义烈之士，也有奸狡阴损之徒。总体上作品展示作为承载着文化传承使命的中国封建社会特殊阶层——士所具备的积极入世的精神。作品描写了王登联、苏纳海舍生真谏的刚风劲节；写了陆健等人“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清高；写了兴时为官的龚鼎孳的“什么时候才能不违心地说话行事”的慨叹